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十辑

春秋记事

——
内蒙古政协领导纪事文集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春秋记事

——内蒙古政协领导纪事文集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十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编委会

主 任：陈光林

副 主 任：傅守正、盖山林、邬宝恒

成 员：云淑贤、王明勤、黎 丽、杨漫宇、李中林、钱占元

编 辑：梁耀君、付巴图、顾超英、杨蔚东、王峰峰、乌云高娃

主 编：黎 丽

责任编辑：梁耀君

校 对：沙 兰

封面设计：丁 强

设计制作：李伟媛

印 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

字 数：350000

印 数：2500

发 行：内蒙古文史书店

时 间：2007年12月17日第一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7-774X

CN15-1081/K

定 价：90.00元

陈光林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一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善于以史为鉴，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和发展的历史，蕴涵着许多传奇和感人的故事。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爱国者、进步人士和各族人民群众，在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抛洒热血、不畏艰苦、执著追求，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激昂的动人诗篇。这段宝贵的历史需要回忆总结，需要留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春秋记事》用独特视角记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奋斗历程，记录了政协工作者在内蒙古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段经历、人生感悟和对事业的追求。无疑，这对于我们追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政协工作者更好地投身到人民政协事业、为建设和谐内蒙古做出更大贡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搜集记录了历届政协领导者对历史的回忆，为历史研究、历史论证提供重要的依据和资料。其实，这段历史并不遥远。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反帝大同盟的建立、自治政府的成立、绥远起义、“三不两利”政策的出台、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文革”岁月、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早期实施、包头大地震、沙产业和草产业的兴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自治区文化大区建设的提出，以及近期一些重大战略措施的出台。这一切，必将再次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深切感触。虽然只是片段的记录和点点滴滴的回忆，但能够生动感人地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内蒙古革命、建设、发展历史的认识。这种记忆和认识，也必将激发人们对建设我们国家和家园的深厚感情，进而转化为奔向小康的强大动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春秋记事》一书的征集、编辑、出版过程中，历届政协领导及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属、子女和同事、战友，为本书积极撰文，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同时，也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紧迫、条件有限，尽管编委会的同志尽职尽责，执著不弃，为出版此书付出了辛勤努力，但遗漏、缺憾之处在所难免，对此，只能留待以后的工作中继续补充和完善。呈此感言，是为序。

2007年9月21日

序 陈光林

- 001 参加国民政府南京“蒙古会议”的见闻 / 博彦满都
- 006 李大钊和内蒙古早期的革命活动 / 吉雅泰
- 011 峥嵘岁月——忆父亲苏谦益 / 苏小河
- 017 小西梁琐忆——记父亲杨植霖 / 杨秀清
- 022 大青山作证——记姚喆在大青山的抗日斗争 / 张秀英
- 025 忆父亲奎璧的革命人生 / 奎元庆
- 032 走人民的道路——父亲孙兰峰谈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 / 孙本一
- 038 创建新中国盛会有感 / 王再天
- 045 铁骨铮铮的老党员——我敬佩的父亲特木尔巴根 / 胡达古拉
- 051 忆我的父亲陈炳谦 / 陈其俊
- 055 辛亥革命的点滴回忆 / 李世杰
- 058 悠悠往事忆父亲——怀念父亲朋斯克 / 朋子杰
- 064 牢记父亲的教诲——纪念父亲乌兰夫诞辰100周年 / 云曙碧
- 069 在内蒙古工业厅工作的日子 / 克力更
- 074 “反帝大同盟”绥远活动点滴 / 武达平
- 080 尤太忠司令员在内蒙古 / 张岳荣
- 086 军旅生涯片段 / 刘华香
- 092 父亲在“文革”后的日子——记父亲孔飞 / 阿木兰
- 098 “落子不悔”精神伴随人生——忆父亲黄巨俊 / 黄保卫
- 102 亲历北平和平解放 / 周北峰
- 109 爱国爱民的父亲鄂其尔呼雅克图 / 色登那木吉勒
- 114 著名爱国报人杨令德 / 杨性恺
- 120 我眼中的张荣臻先生 / 赵振华
- 125 寻找冶金专家谭振雄 / 黎丽 钱占元
- 130 绥中剿匪肃特 / 赵展山
- 134 父亲的故事——怀念父亲赵云驶 / 赵石民
- 140 跟着共产党走民族解放之路——忆父亲那钦双和尔 / 特木尔 娜荣格日勒

- 147 携手共建新绥远 / 王建功
- 153 在内蒙古大学的35年 / 胡钟达
- 160 老校长齐永存的风范 / 珠占
- 166 悠悠往事思一鸣 / 陈伟堃 哈斯 土木尔 余友山
- 173 思念我的父亲——王海山 / 王敏
- 178 “601号”新钢种的成功研制 / 魏兆融
- 182 我在抗日战争中 / 李森
- 189 黄花石赋 / 石生荣
附：赞《黄花石赋》 / 续维国
- 193 忆我们的父亲陈炳宇 / 云雯婧 云雯妍
- 196 敬爱的父亲——乌力更 / 红果 陶娅 乌恩
- 202 政协落实统战政策纪实——记自治区政协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韩明 / 额尔德木图
- 206 不愿抹去的记忆 / 马振铎
- 211 眼科专家李树元的平凡人生 / 乌云高娃 钱占元
- 216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访内蒙古政协第五届副主席刘震乙 / 黎丽 乌云高娃
- 221 政协十年再回首 / 暴彦巴图
- 225 六十冬夏 / 云照光
- 232 防灾减灾之我见 / 王崇仁
- 236 怀念陈杰先生 / 张纪生 张存生
- 242 忆景平同志 / 突克
- 247 岁月留痕——访自治区六届政协副主席兰乾福 / 黎丽
- 251 延安散忆 / 云曙芬
- 258 我与文史资料工作的不解之缘 / 奇忠义
- 264 我与乌兰葛根半个多世纪的佳缘 / 布特格其
- 267 我在政协15年 / 张顺臻
- 272 周君球与内蒙古财政工作 / 李文进
- 276 帮助“三少”民族解困 / 乃登
- 279 我与伊盟农村改革 / 千奋勇
- 285 兴安盟工作片断 / 张佐才

- 289 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前后 / 袁明铎
- 293 留住草原——内蒙古政协草原生态专题调研活动琐记 / 格日勒图
- 298 调查研究琐记 / 乌伦赛
- 303 政协引领我投身绿色事业 / 夏日
- 310 一次难忘的专题调研 / 杨紫珍
- 314 为内蒙古法制建设增砖加瓦 / 陈义遵
- 320 关注民生 直言实情 / 许柏年
- 325 在包头大地震中临危授命 / 谭博文
- 330 追忆郭峰同志 / 王占
- 335 山村纪事 / 冯秦
- 340 浓浓草原情 / 罗锡恩
- 344 难忘的童年记忆 / 奇英成
- 347 中国岩画——我的生命之歌 / 盖山林
- 351 农牧民眼中的财神——追忆我的父亲李仕臣 / 李岩
- 355 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回眸 / 陈光林
- 360 情 结 / 傅守正
- 364 五下兴安 / 包俊臣
- 370 埃及之行 / 刘芝兰
- 376 乌盟农业走出困境的探索 / 韩振祥
- 381 在政协工作中一件最有意义的大事——忆《“三不两利”与“稳宽长”》的出版发行 / 鄂宝恒
- 387 不忘记，不冷漠，不屈服——访问一户城市低保家庭引发的思考 / 王长聚
- 390 附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历届委员会简介
- 394 后记

参加国民政府南京“蒙古会议”的见闻

博彦满都

博彦满都（1894~1980）：蒙古族，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人，奉天筹边专门学校求学。1947年5月，任内蒙古临时参议会会议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夏季，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召开过一次“蒙古会议”，我作为哲里木盟代表之一，出席了这个会议。

会议5月29日正式开幕。内蒙古所属各盟旗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察、绥境内各盟旗，因受阎锡山势力阻挠，未能派人前往参加外，计有哲里木盟代表11人，呼伦贝尔代表是：春德、彭楚克；达斡尔代表金鹤年；卓索图盟代表吴鹤龄、戴清廉、李芳、郭文田、陈效蕃、陈效良、恩和阿木尔、那达木德等；昭乌达盟代表赵化民等多人；新疆、青海方面的各蒙旗也有代表参加；东北四省的代表是：辽宁代表袁庆恩、吉林代表李芳春、热河代表王士仁、黑龙江代表徐霖。此外，还有南京政府各有关部门所派的代表多人。大会主席团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马福祥、孔祥熙、张我华、恩克巴图、吴鹤龄等，他们轮流担任主席，主持会议。记得有一次会议由恩克巴图担任主席，在举行开会仪式上，宣读《总理遗嘱》时，他竟结结巴巴地不能连续背诵下去，中间曾有多次停顿，频由衣袋里取视夹带，使当时与会的代表们有一种离奇的感慨：“国民党的中枢大员们，竟连他们这个日用的口头禅都不会念，遑论其它！”

会议于6月12日闭幕，大会开过几次。大会上的提案，主要是关于蒙旗地方的制度问题，是实施“民族自治”还是继续维持封建王公制度。关于实行“民族自治”的要求，各盟旗代表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有关省方代表怕改变现有的省县、盟旗双重制度，削弱降低省县权力和地位，坚持不能变更。在王公制度问题上，我的提案是要求依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神，废除封建王公制度，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并改变行政系统和区划，设立“内蒙古自治政务

委员会”，直辖中央，不受省县的管辖。在自治政务委员会之下设盟，盟下设旗。其他蒙旗代表的提案，都是要继续保留王公制度。因为王公代表和东北四省的代表，都蛮横地反对我的提案。这个问题成了大会争执的主要问题，每次会议都为之争吵不休。

他们要保留王公制度的理由，是强调蒙古民族的特殊性，强调封建王公的历史性。哲里木盟王公代表乌尔图那苏图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说：“蒙古王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从元朝开始，经过明、清两代，以至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并得到各个朝代、各个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各蒙旗王公就是蒙古民族，没有王公就没有民族了。旗民一旦离开王公，就不能生活，这是蒙古民族的特点。所以内蒙古的王公制度，必须仍旧保留。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绝对多数是拥护王公制度的。”我曾针对他的发言当场驳斥说：“内蒙古的封建王公制度和中国过去各个朝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王朝一样，都压迫人民，奴役人民的；但自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已经消失，专制独裁的君主已经废除，全国各民族共同承认的中华民国，是实行民主制度的，我们内蒙古的蒙古民族，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也应该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享受民主、自由的幸福，不能再过奴隶牛马的生活。封建王公制度，就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制度，



1977年博彦满都
议长与夫人在北
京毛主席纪念堂
前。

是束缚人民、压榨人民的，废除了王公制度，就解除了人民身上的枷锁。所谓没有王公就没有民族，是站在封建王公奴隶主的立场上说的，是不符合我们多数被压迫、当奴隶的蒙古民族心愿的。至于说蒙古人离开王公就活不成，更是荒谬绝伦、颠倒是非的。事实证明：不是王公养活旗民，而是旗民供养王公，王公一旦失去旗民的供养，就无法生活下去。我们为了内蒙古民族的前途和幸福，决不能允许这种不合理的封建王公制度再继续下去。”因为，我的言词比较激烈，触犯了王公代表们。哲盟王公代表乌尔图那苏图贝子厉声地对我说：“你竟敢如此猖狂，我们和你势不两立。”东北四省首席代表辽宁省代表袁庆恩也威吓说：“好！博代表，你不要忙，等我们回到东北再说。”有的人甚至怒气冲冲，想要动手，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因主持会议的马福祥、孔祥熙等从中劝解，始行散会。

5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正争执不下，会议陷入僵局。有一天下午，大会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大会接到你旗来电，说你不是民选代表，是自己冒充前来的，请大会查办。我考虑到要在会上宣布，对你的面子不好看，所以我在这里告知你，你明天就不必再出席会议了，我已给你备好路费，应急速回去！”我说：“谢谢您的好意！但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公事公办，在大会上宣布才对。如果证明我真是冒充代表，可以当场把我驱逐出去，或者逮捕法办；您这样暗地让我走了，大家不明真相，是会有怀疑的。”他又问我：“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那样办于你有什么好处？”我说：“是的，我这个代表不是民选的，是我旗札萨克用公文派来的，我不认为这是冒充。要说这是不合法的，这个责任应当由札萨克负，我并没有错。再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代表，都和我一样，没有一个是民选的。因为我们内蒙古民族在封建统治下还没有得到选举权。要说我不是民选的就无效的话，那么所有的代表都不是民选的，都同样无效。您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就可以提出这种理由进行辩论，让大家公开讨论。”马听了以后就犹疑地说：“那么这个电报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据我的估计，可能是大会上反对我的人，勾结我旗的一些坏人搞的把戏，请委员长详细调查！”最后马福祥把头微点一下说：“好吧，我已明白，你不要管它，还是继续开会吧！”

在双方僵持己见的时候，吴鹤龄等代表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主张在原

有的封建王公制度下，实行一些政治上的改革，使旗民能得到初步的民主。这一提案表面上好像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实质上还是完全维护封建王公制度的。因为让王公制度存在，而要在他们的封建统治下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完全是骗人鬼话。吴鹤龄在休会期间几次向我征求意见。我对他的回答是：“根据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精神，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将近20年了，内蒙古的奴隶制早该改变，蒙古民族自治必须实现，我这个代表只能代表旗民这种迫切愿望，至于什么折中的办法，是无权同意的。”

会议虽然进行了很长时间，从表面上看也很热闹，实际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是南京政府主持会议的大员们，还说什么会议是有成绩的，并对出席的代表做了敷衍、羁縻、笼络的奖誉。记得在会议将届结束时，行政院长谭延闿接见过一次全体代表。他说：“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好。我见到各位代表的丰采和会议上激烈争辩的情形，非常高兴。但蒙古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以后象这样的会还要多开。”大会闭幕时，马福祥在致词中，也有这样大同小异的言论。代表们听了这些讲话后，心情上有不同的感触。有些代表，特别是比较顽固的王公代表们，因为会议的拖延不决，使封建王公制度仍能维持原状，继续保留下去，而感到满意和高兴。有的代表则因有关蒙古问题的重要提案都未得到解决，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实行“民族自治”并无诚意，对蒙古人民的生活并不关心，感到非常失望。

回旗以后，平民同志会的秘书长玛尼巴达拉和我一见面就说：“你在南京开会期间，我们旗里的辅国公诺青额（即刘艺亭）让吴永年，用我旗人民的名义，向南京‘蒙古会议’打了个电报，否认你是我旗的人民代表。吴永年是诺公爷地局子的管帐先生，诺让他写，他敢不写，他现在非常后悔，又怕你要追究这件事，托我向你先通款曲，他还要亲自给你陪情的。他是我的朋友，还是个有为的青年，请你原谅他！并加以提拔！”我对他说：“陈琳的檄文，是袁绍让他写的，曹操还不追究他。我知道这里的内情，也决不怪他。”从此以后，吴永年便和我接近起来，也成为我的朋友。

民国20年（1931年）我看到南京蒙藏委员会出的刊物，内中有记载当时“蒙古会议”的情况，他们把我当时的提案和发言，篡改了不少，与我的原意

不符。我为此事曾经向蒙藏委员会提过质问，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被日寇侵占，没有得到答复。

我出席南京“蒙古会议”当时希图通过会议能废除不合理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王公制度，实行“民族自治”。直到解放后我才认识到：所有这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胜利后才能实现，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祈求“民族自治、平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大钊和内蒙古早期的革命活动

吉雅泰

吉雅泰（1901~1968）：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1947年5月，任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55年~1967年，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6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是我党的坚强而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他主要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工作。当时，党在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同时，就立即着手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内蒙古是党首先进行革命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初自发的革命斗争，正是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局党的负责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关怀下，才逐步找到了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党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首先是从蒙古族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的。1923年夏，我们一批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在十月革命炮声的震荡下，在五四运动激流的冲击下，从千里迢迢的内蒙古土默特旗来到了北京。北京是各种政治、文化尖锐斗争的中心，它激荡着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心。我们来到了北洋军阀政府开办的蒙藏学校，那时，这个学校在封建军阀王公把持下是十分腐败落后的，提倡尊孔复古的封建思想和我们渴求解放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这时，我们在政治上陷于苦闷彷徨和窒息的境地，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未来的理想，摸索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渴望找到蒙古族人民解放斗争的依靠力量。

正当我们在为自己民族的苦难焦虑的时候，1923年冬，中国共产党象冬天的太阳一样照到了冰冻的蒙藏学校。党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我们这一批内蒙古的民族青年，就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早期杰出的领导者李大钊同志亲自培养和领导下成长起来了，为党最先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贡献出一份力量。

吉雅泰副主席
在内蒙古政协
会议上讲话
(1964年)。



当时，内蒙古地区正处于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各派军阀频繁交替的割据统治之下，帝国主义分子、军阀、官僚、地主、高利贷商人和内蒙古封建王公相互勾结，对蒙汉各族农牧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内蒙古广大牧区和农村，正不断爆发蒙汉各族农牧民的反抗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尖锐地认识到要迅速地把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把它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使它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一批共产主义的蒙古族干部是不可能的。因此，正是在这样一种要求下，李大钊同志和其它北方局党的负责同志，如邓中夏、赵世炎等，都非常重视和关心蒙藏学校的工作，用很大的力量来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他们亲自向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形势，向我们说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原因和背景，指出蒙古族人民要推翻军阀、王公两座大山就要团结各族人民，因为军阀不仅汉族有，蒙族也有……。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都非常浅显。然而在当时给我们是多大的启发和鼓舞呀！

从此，我们这一批蒙古族青年就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政治上立即活跃起来了，我们积极地参加在党领导下的各种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党的教育下，1924年我们这批蒙古族青年如乌兰夫、奎璧、多松年、李智裕等同志和我就参加了党，在中国共产党中有了第一批蒙古族党员。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李大钊同志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当时，正是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他深深理解到迅速培养一批蒙古族干部对开展内蒙古

地区的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因此，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他以巨大的热情关心我们这批蒙古族青年的成长，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提高和成熟。那时，蒙藏学校的党组织经常举行党的会议，李大钊同志和他领导下的北方局的同志们是常来参加。他们在会上经常作时事报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去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后回来作的一次报告。在北京大学三院的礼堂中，我们蒙藏学校的几十个党团员都参加了。大钊同志还是那样简朴地穿着一件灰色粗布棉袍，浓眉浓髭，一头浓密而乌黑的头发，架着一付无边的眼镜，神采奕奕地向我们报告了苏联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当他谈到苏联如何解决少数民族问题，逐步实现民族平等时，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差不多一字一句都紧扣着我们的弦，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这次报告给了我政治思想上很大的帮助。从此，我逐渐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懂得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联系，我坚信：内蒙古民族的真正出路和彻底解放就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

大钊同志在以巨大的热情来鼓励我们努力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同时，也非常注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关心我们的业务。他对我们总是那样循循善诱、爱护备至。常常亲切地拍着我们的肩膀说“好好干！”记得，我们当时许多人由于参加紧张而繁忙的政治运动，常常忽视理论书籍和业务课程的钻研，他就不止一次地劝告我们在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同时也一定要认真读书学习。并指出要精读一些革命理论基本课程，将来回到内蒙古进行革命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同时还十分认真地提醒我们要注意抵制某些人蜕化行为的影响，以确保自己队伍的纯洁。大钊同志这种出于革命利益，迫切希望革命干部迅速成长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记得，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会上，就曾满腔热情地向青年学生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产生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当然，大钊同志这种殷切的期望也同样是寄托在我们这批蒙古族青年身上的。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关于建立民

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以后的期间，从我向大钊同志几次有关内蒙古工作的请示接触中，我深感到大钊同志是党的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对于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不遗余力的。那是1925年初，正是党支持孙中山北上，发起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时候，蒙藏学校的党组织积极发动革命青年支持这个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党派我已到了内蒙古（绥远）地区，组织了“绥远国民会议促进会”，并随后选派出奎璧、赵诚、崇德臣和我到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李大钊同志和孙中山亲自主持以反对军阀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的。就在会议期间，大钊同志在会外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代表，就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作了许多具体而详尽的阐述。他提醒我们注意国民党右派在会上的破坏活动，并反复说明和要求我们在会上要正确贯彻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扩大左派、批评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要我们在会上坚持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提倡关税自主”的主张……。不久，孙中山逝世，大钊同志在北方团结国民党左派，同违背孙中山遗教的国民党的右派——西山会议派作了坚决的斗争，这说明了大钊同志是用自己的行动正确地贯彻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还有一次是在1925年的秋天，因为请示一些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我来到了他的家里。大钊同志的生活是那样的简朴，家中什么陈设也没有，只有简陋的家具，但他的案头却是堆满了书简。当他和我谈起有关革命问题时，他是那样滔滔不绝，精辟透彻，他的谈吐举止是那样温文儒雅，而内心又是如火如荼，不断的给人以一种巨大的鼓舞。他对当时我们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并决定要我们参加这个组织，而且要在这个组织内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还要我们多做一些实际的群众工作，努力发展和团结一切的进步势力，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废除王公扎萨克的封建特权制度。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团结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那个时候，他曾起了积极的作用，无疑地，这与李大钊同志当时的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当请示完毕，我们向他告别时，他又那样关心着我们的安全，小声地告诉我们门口那个捧着铜香炉的人是个特务，

出门后要赶紧甩掉这个尾巴。这使我们都意识到大钊同志当时在反动的北洋军阀鹰犬的日日夜夜追捕下，秘密而紧张地工作。他常常保持着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警惕性，关心着自己，也更关心着同志们的生命安全。

1925年到1926年间，以湖南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在北方各省，如河北（直隶）、河南、内蒙古各地都开展了农民运动，当时大钊同志立刻予以关注，经过调查，他认为各地掀起的农民武装运动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一个伟大的势力”，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他指出，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必须去组织和教导农民，把农民运动引向正确的道路。因此，大钊同志曾精心研究这个问题，亲自训练干部为各地农民运动输送干部，当时党把蒙藏学校的一批青年派往广州，参加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批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导下的青年干部，回到内蒙古后对当地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时，内蒙古各地农民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对地主豪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内蒙古地区民族的组成特点，为了广泛地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作为开展内蒙古地区革命的可靠基础，于1925年冬，在张家口成立了工农兵大同盟。这个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主要阵地。当时，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有200多人，他们来自绥远、察哈尔、热河各地，其中包括蒙、汉各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和士兵代表。大会选举了李大钊同志为书记。大钊同志亲自主持成立大会。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人制服，融洽自如地往来于群众之间，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一些工人见他穿得那样破烂，都要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他只是含笑的说：“还是您们穿吧！”他在会上的演说曾特别强调蒙汉民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重要意义。并一再号召，蒙古族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这是大钊同志给我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是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从那时候起，正是在以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局负责同志的精心抚育下，蒙藏学校培养了第一批党的内蒙古民族的干部，1925年到1926年间，党把他们分批送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以及天津党训班学习，为后来内蒙古的革命运动撒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